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战略趋向

易 信 彭 慧

摘 要:受外部环境深刻影响、内部条件深刻变化、新科技革命深刻驱动,“十五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仍能达到年均 5.1% 左右,2030 年人均 GDP 有望达到 1.7 万美元,我国将进入发展水平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冲刺期,增长动力从“传统要素+投资驱动为主”向“新型要素+TFP+消费驱动为主”转变的攻坚期,工业化进程从“传统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换的巩固期,城镇化进程从“城镇化加速期”向“城镇化成熟期”转换的过渡期,以及绿色发展从“污染治理为主”向“低碳转型为主”转换的调整期。应顺应、适应、引领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变化,及时优化战略取向并强化战略支撑,合力确保“十五五”时期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趋向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5)04-0031-13

发展的阶段性作为特定历史时段的发展总结,具有较强的经验总结特征,阶段划分大多体现了相关变量的系统性和历史性变革,而不同阶段之间的演化和延续则体现了继承发展或转折变化的延续关系。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人均水平持续提升、质量效率持续提高,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同时,世界经济仍将处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新冠疫情后的逐步恢复期、特朗普 2.0 下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的拓展期,我国面临“危”“机”并存的复杂外部环境。结合国内外发展形势,科学研判“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基本趋势、目标导向、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对于科学制定符合发展实际、具有引领性的发展战略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一、“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十五五”时期上承“十四五”,下启“十六五”,承担着为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基础的重任,是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钱纳里、罗斯托等提出的发展阶段理论表明,以人均 GDP 衡量的总体发展水平是决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关键变量。“十五五”时期我国仍需努力实现更高经济增长速度,保证以人均 GDP 衡量的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才能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 2035 年实现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争取到更多主动权,也才能有效应对后续增长压力。

作者简介:易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彭慧,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从周期趋势看,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行并“前快后稳”

从短周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以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前后为起点的下行期并将延续至2025年前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将全球经济带入新的周期阶段,世界经济增速已经从新冠疫情暴发前五年年均3.1%降至2023年的2.8%、2024年的2.7%,进入增长低迷期。受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影响,叠加我国房地产行业调整拖累、国内需求不足、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等多重影响,我国经济进入短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新冠疫情暴发前五年年均6.7%降至2023年的5.4%、2024年的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实现4.6%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内多数学者研究判断,2025年我国经济仍然有能力实现5%的增速。这意味着我国经济正进入企稳回升的探底阶段。

从中周期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我国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到2030年左右将取得重大成果并进入新一轮中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呈现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投资、低贸易趋势,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主要国家纷纷出台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世界经济转而出现低增长、高通胀趋势。同时,发达国家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市场、技术等方面也依然受制于发达经济体,全球供需衔接模式仍在深刻调整,科技创新逐步进入平台期,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而新的动力尚在培育,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并还将持续至2030年前后。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增长动能加快转换,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也将在2030年前后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

从长周期来看,2000年信息泡沫破裂、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及我国经济进入第五轮长周期下行阶段并将延续至2030年左右,同时新科技革命加快发展并将在2030年前后开启本轮长周期复苏阶段和第六轮长周期。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经济增长长周期等同于技术革命周期。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两个周期之间的衰退和调整阶段,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全方位赋能经济发展各领域,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来源,2030年之前全球经济仍处于第五轮周期的下降部分,2030年左右将进入下一轮长周期的繁荣阶段。当然,从近年发展经验看,新科技产业革命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正向增加效应或将会比过去几轮科技产业革命要小,出现所谓的“生产率悖论”,也即进入第六轮长周期后,全球及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将出现中枢下移。

(二)从支撑因素看,具备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利条件

一是资源要素总量丰富且质量不断提升。一方面,人力资源数量减少但素质明显提升。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不可逆转地向老龄化方向发展,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常态^[1],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呈下降趋势,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但当前多达8亿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超2.5亿人,近年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超1000万人,2012—2024年大学毕业生数量累计超过1亿人,劳动力素质在持续提升。综合来看,我国就业人口增长率将从“十五五”时期的年均-0.5%降至“十六五”时期的-1%,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25年的10.6年提升至2035年的11.2年。另一方面,物质资本“速减质升”和数据资本“速稳质升”。就物质资本而言,积累速度下降但质量上升。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储蓄率还将逐步降低,加之随着传统基础设施日臻

完善,折旧率相对较高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比重上升,带动物质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但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技改投资等“补短板”与“升级型”投资潜力和空间仍然较大,且对先进设备、先进工艺等方面的投资往往能带动技术进步,近年来其以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增长,带动物质资本存量质量不断提升。综合来看,我国物质资本存量积累增速将从“十五五”时期的年均 5% 降至“十六五”时期的年均 3.8%。就数据资本而言,稳定积累且质量上升。据相关测算,我国数据资本与 GDP 的比例已经从 2003 年的 0.11 逐步提高至 2020 年的 0.21^[2],之后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加快、数据市场基础性制度不断完善,未来十年数据资本有望保持年均 15% 左右的稳定增速,同时数据资本质量不断提高。

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虽有不确定性但呈上升趋势。一方面,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升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动力来源。2024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创新指数排名居全球第 11 位。随着我国创新生态体系和社会创新大环境的形成,自主创新的累积效应将迸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也将为我国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技术的发展带来新机遇,但同时也面临大国博弈加剧下技术脱钩加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特别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将为我国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创新突破、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保障。结合已有研究,并考虑疫情等的影响,“十五五”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概率能保持在年均 1.6% 左右、“十六五”时期在年均 1.8% 左右,略高于“十四五”时期以来的年均 1.5% 左

右。如果我国能在前沿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上实现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还有望进一步提高至 2% 左右。

三是供需互促推动经济增长迈向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且潜力巨大。供给和需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新的消费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新的供给也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二者在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中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新优势。当前我国已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2024 年底已经超过 4.2 亿人,到 2035 年有望超过 7 亿人,将建成强大的国内市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汽车、家用电器、数码产品等耐用消费品消费量不断增长并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还有巨大增长潜力。同时,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与衣食相关的食品、服装等非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比重会逐渐下降,而与住行相关的汽车、中高端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支出比重逐渐上升,服务消费在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后开始占主导地位。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3 万美元,进入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社会跨越的关键期,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更多体现在更高品质的服务消费上。近年来,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享受型服务消费支出比重明显上升,带动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升至 2024 年的 46.1%,促进了相关服务业发展。而且,成长于信息化时代的“80 后”“90 后”“00 后”,更加追求多样、个性的高品质生活,对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消费场景的需求快速增加,将进一步带动产业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需求升级和供给升级相互促进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三)从定量测算看,2030 年人均 GDP 有能力达到 1.7 万美元

经典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来源是投入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前,测算潜

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函数法、滤波法、结构计量模型法、国际经验类比法、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等^[3]。从已有文献来看,主要研究认为“十五五”及中长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走势,并形成“十五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在5%以下^[4-6]、在5%~6%之间^[7-9]、在6%以上^[10-11]等代表性观点。

考虑到生产函数法更适合我国这样的转型特征明显的经济体,并可综合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要素正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12],为此,构建如下包含数据资本的C-D生产函数模型来测算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Y=AB^{\alpha}K^{\beta}L^{1-\alpha-\beta}$$

其中, Y 代表实际产出, A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B 代表数据资本存量, K 代表物质资本存量, L 代表劳动力数量。基于1990年以来的我国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并考虑未来要素收入分配变化,数据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的贡献因子分别为0.1、0.45和0.45。

结合支撑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劳动力、物质资本、数据资本等投入要素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预测判断,采用包含数据资本的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表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从2025年的5.3%降至2030年的4.9%、2035年的4.2%左右,“十五五”时期年均均为5.1%左右、“十六五”时期年均4.6%(见表1)。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充分实现的情况下,到203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约1.7万美元(2020年不变价美元,下同)。测算也表明,2025—2035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能达到年均4.9%,在潜

在经济增长速度充分实现的情况下,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2万美元,意味着即便遭遇疫情等超预期冲击,我国仍有足够能力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相对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这也表明,只有“十五五”时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为“十六五”时期经济发展减轻压力,为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二、“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综合过程,受外部环境深刻影响、内部条件深刻变化、新科技革命深刻驱动,伴随以人均GDP衡量的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经历结构性和系统性变革。

(一)发展水平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冲刺期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陷阱^[13]。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量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往往面临经济增长速度过早过快下降问题,甚至出现与高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难以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所需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经济体至少需要15—20年、平均至少18年,俄罗斯、阿根廷等其他经济体所需时间普遍多于20年,综合全球典型经济体来看至少需要30年。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1996年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

表1 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预测及各增长因素的贡献(%、个百分点)

	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劳动力	物质资本	数据资本	全要素生产率
“十五五”时期	5.1	-0.2	2.2	1.5	1.6
“十六五”时期	4.6	-0.4	1.7	1.5	1.8
2025—2035年	4.9	-0.3	2.0	1.5	1.7

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截至 2025 年,我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已经超过 15 年,已经开始进入亚洲经济体所需跨越时间范围,进入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冲刺期。

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历史性突破 1 万美元,2024 年超过 1.35 万美元,与世界银行 2024 年公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 1.4 万美元的差距缩小至 500 美元,已经逼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逼近高收入门槛值时,实现中等跨越的风险和困难会大大增加^[14]。那些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要显著高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如,跨入高收入阶段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5.5%、8.6% 和 8.4%,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他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平均增速要低于这个水平。在我国人均 GDP 逼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下降,同样面临持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挑战。测算表明,我国虽然能在 2027 年人均 GDP 达到 1.50 万美元、跨越届时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1.49 万美元(见图 1),进

入统计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要稳定提高发展水平并尽快成为成熟的高收入经济体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仍需要抓住机会窗口确保“十五五”时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

(二)经济增长动力从“传统要素+投资驱动为主”向“新型要素+TFP+消费驱动为主”转变的攻坚期

从要素驱动来看,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其中约有 35%~45% 的增长贡献来自物质资本投入。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表明,工业化初中期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由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转向技术要素,科技创新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动力。那些成功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后均及时抓住“窗口期”转换了增长动力。如,从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的前五年到之后的五年,德国全要素生产率(TFP)从达到美国的 69.4% 升至 70.6%,法国从达到美国的 98.6% 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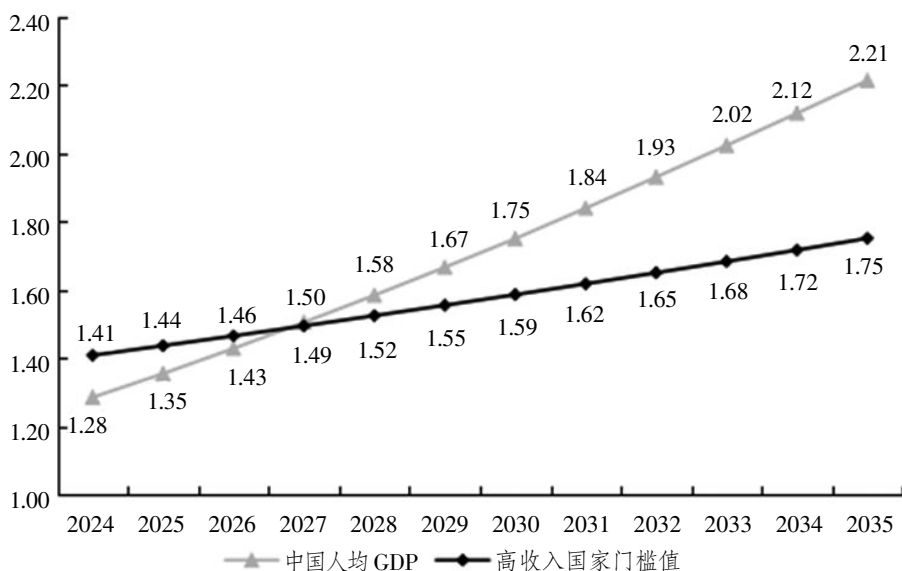


图 1 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及我国可实现的人均 GDP 预测(2020 年不变价美元,万美元)

注:综合考虑世界经济增速、人口增长、通货膨胀等因素,按照世界人均 GDP 年均 2% 的实际增幅来推算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变化趋势。

至 101.9%，韩国从达到美国的 59.8% 升至 62.1%。当前，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债务过快积累和传统投资空间缩小等，既有传统生产要素、投资需求驱动的增长动力机制日渐难以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在转换。“十五五”时期，我国处于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新技术推动新增长动力快速成长，进入以数据要素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结合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等测算，预计我国 TFP 与美国的比值将从 2019 年的 0.403 提高至 2030 年的 0.5，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十四五”时期年均 30% 左右提高到 2030 年的 35% 左右。

从需求驱动来看，近年来，我国消费率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呈上升趋势，但与我国发展水平相比仍然偏低。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阶段从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等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以及追求生活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上升。国际经验也表明，消费率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呈现先降后升的 U 形趋势(见图 2)，各国消费率由降转升的拐点存在差异但多发生在人均 GDP1 万美元左右。随着我国居民消

费能力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文化娱乐、健康服务、休闲旅游等发展型、享乐型和以满足更高需求为导向的新型消费将快速增长，到 2030 年我国消费率有望升至 62% 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60% 以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破旧立新塑造新的增长动力和优势，亟须突破激励机制重建、利益分配重构、存量资产出清等阶段性困难问题。

(三)工业化进程从“传统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换的巩固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推进，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不足 20% 持续上升至 1980 年的 43.9%。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10 年之前，工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所占比重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之后开始逐步下降。2023 年工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所占比重分别降至 31.7% 和 38.3%，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中所占比重由 2006 年 32.5% 的最高点下降至 2023 年的 26.2%，已经出现后工业化阶段所谓的“去工业化”迹象。从主要工业品产量来看，钢铁、水泥、汽车等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典型工业产品产量达峰或增速明显放缓。其中，钢铁产量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在 2020 年之后明显放缓，产量基本稳定在 2020 年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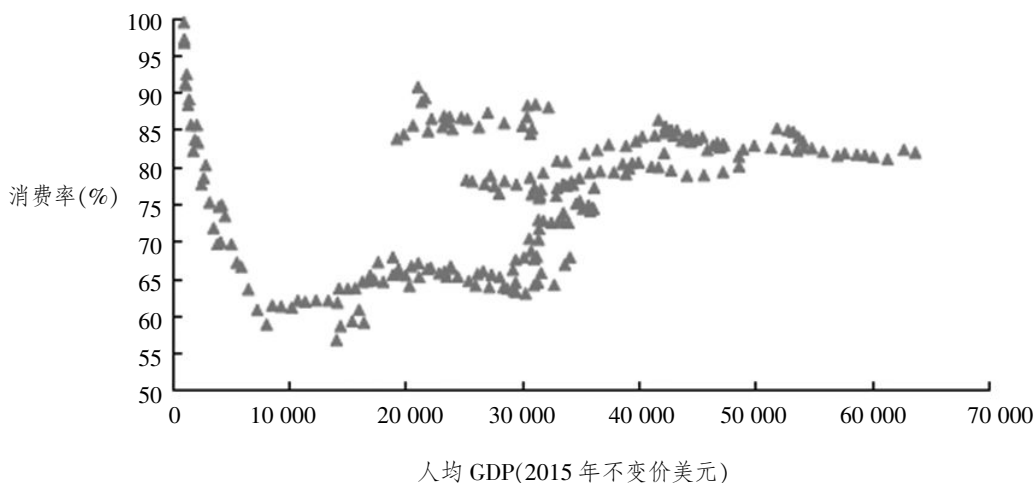


图 2 主要发达国家人均 GDP 与消费率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选取美国、日本、英国、韩国和德国的数据。

水泥、平板玻璃、电视机的产量在 2020 年之后也基本稳定或略有下降。汽车产量在 2017 年达到 2 901.8 万辆的峰值之后开始下行,尽管受出口和新能源汽车技术替代影响产量再度上升,2024 年达到 3 155.9 万辆,但也仅略高于 2017 年的峰值。这些都意味着,2020 年以来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巩固期。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并不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终止或者不需要深化工业化进程,更意味着基本实现了新型工业化^[15],而是进入更加强调与数智化新技术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含绿量的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阶段,主要任务是聚焦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与绿色低碳转型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现阶段我国产业整体上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农业、工业、建筑、服务业领域仍有大量环节尚未实现深度数字化智能化,这将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而不断深化。同时,我国虽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装备制造、储能、输配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积累起了显著的技术优势和产能优势,但也面临弃风弃光挑战以及储能、输配电等领域发展问题,在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推动下也将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趋势下,电子信息、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将日益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动能。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三次产业比重将呈现较为平稳的发展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则逐年上升,三次产业比重或将从 2024 年的 6.8%、36.5%、56.7% 调整为 2030 年的 6%、34% 和 60%,制造业增加值比重降至 25% 左右。

(四)城镇化进程从“城镇化加速期”向“城镇化成熟期”转换的过渡期

根据经典的城镇化理论,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一般遵循先缓慢上升、而后加速上升、最后逐渐趋于平稳的“S”形曲线演进规律,三个阶

段依次被称为“城镇化起步期”“城镇化加速期”“城镇化成熟期”。其中,“城镇化加速期”是城镇化进程最为关键的阶段,又可细分为“城镇化加速期前半程”和“城镇化加速期后半程”两个子阶段。2016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8.8%，“十三五”时期以来已进入城镇化加速期后半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幅度从“十三五”时期的 1.31 个百分点降至“十四五”时期前四年的 0.78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速度已经出现下降(见图 3,下页)。2024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67%，“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将继续向深入推进,但随着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已常住在城市,“城镇化加速期”将逐渐步入尾声并开始向“城镇化成熟期”过渡。

选择目前被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广泛采用的 Logistic 曲线拟合法构建数量模型^①预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到“十五五”时期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超过 70%,达到 71% 左右,进入人口总规模负增长、城镇化高位水平和低速提升的复合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城镇化中后期基本出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格局,即人口经济向大都市区集聚,但在大都市区内部形成中心城区、郊区和周边中心城市的多中心功能组织模式^[16]。过去十几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出现了大部分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超大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集中,少部分人口向小城市和县城转移,同时大量农民工尚未完成市民化。“十五五”时期,随着我国城镇化向成熟期过渡,城市化地区吸引农村人口的强度将出现明显下降,再加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成熟发展大幅降低工作生活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限制、60 岁以上老年外出务工人员规模性返乡等,将出现人口规模化地从拥挤

①构建如下模型: $U = \frac{A}{1 + \alpha e^{-\beta t}}$,其中, U 为城镇化率, A 为城镇化率极限值($A \leq 1$), α 、 β 为待估参数, α 为城镇化起步初始值, β 为城镇化率增长速度, t 为年度表示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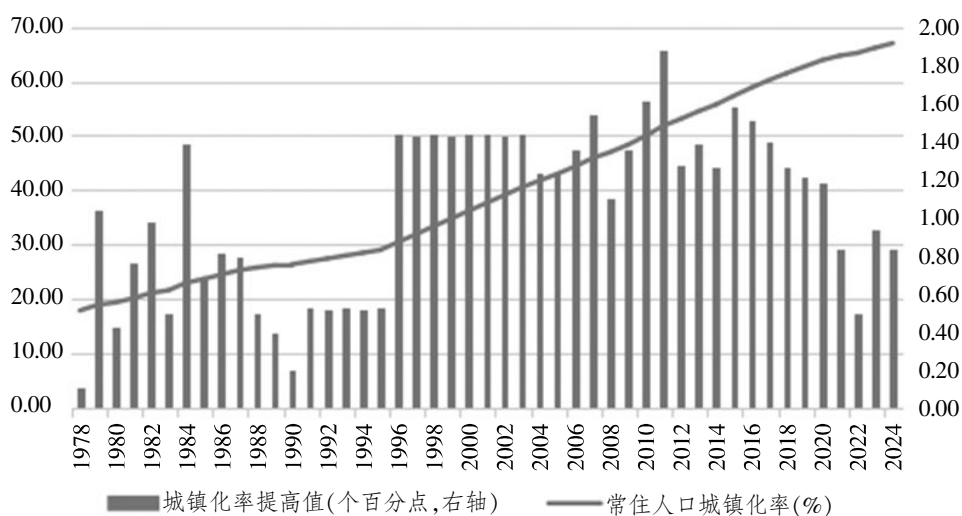


图3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及其各年提高值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的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城镇回流,城市化地区将从过去侧重“人口与产业集聚”转向侧重“科技创新资源集聚”,重点转向内部功能、结构和品质优化。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进入尾声,城乡融合发展的迫切性也将进一步增强。

(五)绿色发展从“污染治理为主”向“低碳转型为主”转换的调整期

近年来,我国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几乎都走了先污染后治理之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在8 000~10 000美元,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在5 000~7 000美元^[17]。从发展规律来看,我国已经跨过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拐点。当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各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57个国家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超40%,其中大部分是包括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经济规模和碳排放量均较大的发达国家。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程度呈现先增后减态势,出现碳排放倒U型曲线变化

规律,主要国家碳排放的下降拐点一般出现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后,届时的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城镇化率达到75%以上(见表2,下页)。2024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6.7%、城镇化率达到67%,与碳排放倒U型曲线规律要求的发展条件尚有差距(见图4,下页)。

不过,当前我国已进入碳排放增长相对平缓的阶段,每单位GDP增加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大幅减少,特别是2012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 000美元之后,二氧化碳排放增速已经大幅放缓(见图5)。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在逐步减小。基于Kaya恒等式对我国碳排放驱动因素贡献的分解表明,碳排放量还在随人均GDP提高而增加,随单位GDP能耗和能源碳强度下降而减少,随人口总量减少而减少(见表3)。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碳排放仍将随经济增长而增加。这也表明,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十五五”时期对通过绿色低碳转型来降低单位GDP能耗和能源碳强度提出更高要求,进入低碳转型为主的绿色发展阶段。

表 2 主要国家碳达峰时的部分经济指标情况

国家	时间	人均 GDP(美元)	城镇化率(%)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工业增加值比重(%)
德国	1990	23 358	73.1	56.3	37.3
英国	1991	19 900	78.1	67.5	27.0
法国	1991	21 675	74.2	62.8	24.3
巴西	2004	3 638	82.5	54.9	24.3
澳大利亚	2006	36 045	84.7	63.7	25.6
美国	2007	44 115	80.3	73.9	21.5
加拿大	2007	44 543	80.4	62.9	28.7
意大利	2007	37 822	68.0	64.1	23.8
日本	2013	40 455	92.5	71.4	26.7
韩国	2013	27 182	82.3	54.0	34.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趋向

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使然。要顺应、适应、引领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转变,抓住主要矛盾,及时优化战略趋向,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十五五”时期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一)探索构建以“以我为主、合作共赢”为宗旨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

大国经济内部可循环的关键是发挥主场优势、提升发展潜力,做大做强国内经济高质量循

环,同时以国内经济高质量循环牵引国际大循环。要充分发挥日益富强的中国外交优势和日益彰显的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参与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和跨国协作中更加积极有为,在维护国际公共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中更加务实地承担大国责任,通过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同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大国经济优势,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金融、信息、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门槛,吸引海外资源流入国内。研究实施“海外中国”战略,围绕拓展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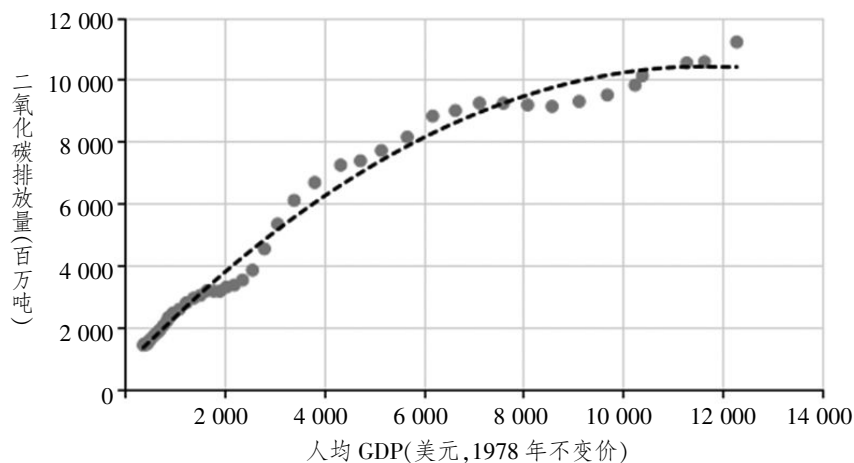


图 4 我国人均 GDP 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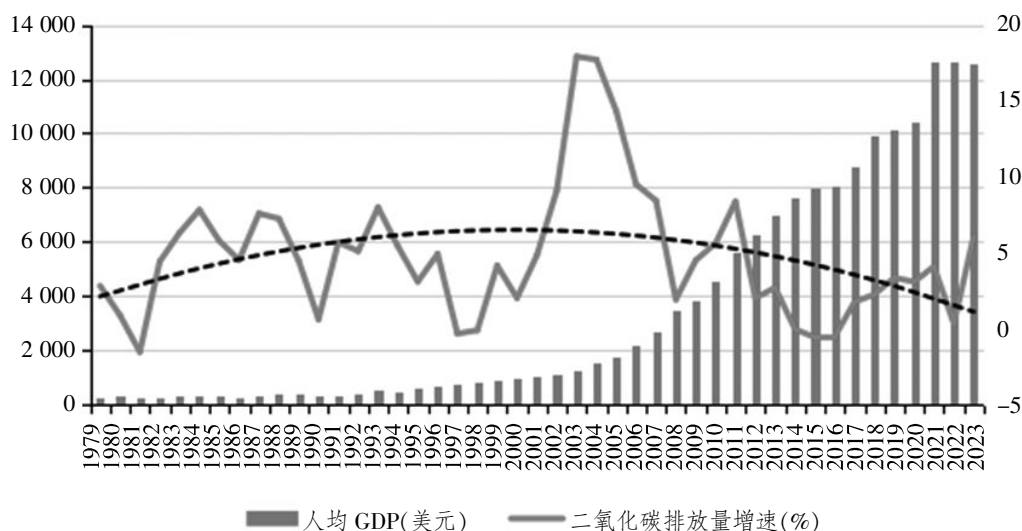


图5 我国人均GDP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3 基于Kaya恒等式的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贡献量及贡献率分解

	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的贡献量(百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的贡献率(%)				
	人均GDP	单位GDP能耗	能源碳强度	人口总量	合计	人均GDP	单位GDP能耗	能源碳强度	人口总量	合计
“十二五”时期	3 066	-1 676	-562	215	1 043	294.0	-160.7	-53.9	20.6	100
“十三五”时期	2 406	-1 345	-485	256	832	289.2	-161.7	-58.3	30.8	100
“十四五”前三年	1 785	-296	-381	-19	1 089	163.7	-27.1	-34.9	-1.7	1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测算。

路”，建立跨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产业体系中打造核心优势。

(二)深入推进以提升人力资源素质为重点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

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发展优势，但质量不足是我国转换增长动力、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的短板。要进一步完善生育补助、生育假期、生育惠民等组合式生育支持政策，通过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转变人们的生育预期，尽快减缓生育率持续快速下降势头。加快建立从劳动预备到创业就业转岗升职全过程的终身培训体系，配套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保

障机制。制定新时代青年人才成长计划，引导青年向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公共管理等基础性服务领域和制造业领域就业，完善后续转岗、晋升、深造等保障机制。深入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培训和就业服务，积极创造有利于大龄劳动者稳定就业、二次就业的机会。逐步建立健全人员编制、土地供应、转移支付、公共服务与区域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行建设用地、用能、环境容量、碳排放等指标差异化管理，更好适应人口流动趋势。尽快消除影响人口流动的户籍、编制、行业、年龄等隐性壁垒，提升人口自由有序流动便捷性。完善吸收高

技能人才移民制度,便利各类国际人才跨境流动,减少自主就业等相关限制,积极引进好、利用好全球高端人力资源。

(三)大力实施以提振消费、畅通循环为重点的全方位扩大内需战略

我国仍处于疫后消费恢复性发展向扩张性发展的过渡期,要着力避免消费跌入过低均衡水平。要用好存量政策、实施增量政策,加力“真金白银”政策,重点加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建立健全财政支持公共服务机制以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支出,大力提振消费。同时,考虑到投资短期看是需求、长期看是资本积累,要尽快转变“投资过剩论”“投资无效论”等观念,保持合理投资水平以稳定经济增长、增加居民就业、促进居民增收,通过扩大投资固本培元稳定短期经济增速、提高长期增长潜力并提升消费内生动能、助力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推动投资动能和消费动能有效衔接以撬动国内需求。考虑到我国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公共服务提标、消费设施提质、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仍有较大投资空间,要通过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扩大专项债支持范围等整合财政资源,支持这些领域扩大投资,强化高质量供给。同时,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在土地、能耗、排放指标等方面向优势地区优势领域倾斜,扩大投资空间。建立投资项目带动就业评估机制,健全跨区域产能和劳动力合作机制,强化投资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的作用,更好支撑居民消费增长。

(四)深入开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的深度工业化战略

工业是驱动国民经济长期增长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部门,也是承载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土壤”^[18]。在新科技产业革命背景下,数智技术和工业技术的深度融合将带来新的生产制造模式和新的产业组织形态,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顺应新科技产业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化全面创新

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监管框架、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受益机制,激发企业家、科研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建立健全相关核心技术领域的产业投资基金,聚焦战略性、引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聚集全社会资源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支持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应用,支持人工智能等具有引领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继续支持全社会设备更新改造,稳定制造业比重,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五)逐步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品质化、城乡融合化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当前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入新阶段,需要突破体制机制创新约束,更加聚焦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品质化和城乡融合化等重点问题。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新一代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为突破口,实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地挂钩。对于个别放开户籍限制条件尚不成熟的超大城市,要进一步深化探索居住证制度的可行路径。继续推进人口和经济向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等优势地区集聚,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化地区引领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点作用。同时,要以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更好满足品质化城市需求。发挥县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试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管理,支持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高效流通,加快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大市场。

(六)有序推动以清洁化、低碳化为重点的绿色发展战略

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过程,需要协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创新,建立覆盖能源资源要素配置、绿色技术创新、生态价值实现等全方位的绿色发展激励机

制,重点推进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源开发利用机制和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创新。要“先立后破”推进化石能源低碳清洁高效利用,支持燃煤机组升级改造,提升化石能源清洁、节约和循环利用水平。研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创新攻关工程,突破“化石电源+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关键技术瓶颈,推动节能降碳、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应用。推进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建设,完善新能源消纳机制,多元化稳健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分布式能源。配套推进储能、需求响应、智能电网发展,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实现源网荷储多方资源的智能友好、协同互动。同时,要鼓励发展和应用清洁能源、清洁生产技术,抓住设备更新政策机遇,加快对现有落后设备、工艺的改造升级步伐。深入实施电气化行动,在重点工业园区、城乡供暖、交通等领域开展电能替代示范和新能源应用试点,以全方位能源消费转型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七)统筹健全以防范化解风险矛盾为重点的安全发展战略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向 2 万美元冲刺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也将是经济社会矛盾多发期,以安全保发展显得格外重要。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畅通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机制,努力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着力加大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等补充社保基金力度,大力夯实社会稳定基础。有序有力统筹地方化债和高质量发展,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尽快建立金融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着力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统筹化解房地产价格泡沫风险、结构性供给过剩风险和房企违约风险,夯实地方保交房基础,加快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引导

房地产行业调整并实现“软着陆”。加强宏观政策力度、节奏、方式的论证和预判,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引发新的风险。[Reform]

参考文献

- [1] 乔晓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社会政策研究,2024(1):47-63.
- [2] 刘涛雄,戎珂,张亚迪.数据资本估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3(10):44-64.
- [3] 冯明.中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研究:进展、共识和分歧[J].财经智库,2020(5):29-57.
- [4] 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J].经济学报,2017(4):1-27.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4):5-22.
- [6] 张晓晶,汪勇.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经济增长展望——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J].中国社会科学,2023(4):4-25.
- [7] 陆昉,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J].世界经济,2016(1):3-23.
- [8] 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20—2029):战役增长模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 [9] 黄泰岩,张仲.实现 2035 年发展目标的潜在增长率[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2):4-12.
- [10] 刘伟,范欣.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J].管理世界,2019(1):13-23.
- [11] 林毅夫,文永恒,顾艳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展望:2020—2035、2035—2050[J].金融论坛,2022(6):3-15.
- [12] 徐翔,赵墨非.数据资本与经济增长路径[J].

- 经济研究,2020(10):38-54.
- [13]姚枝仲.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J].国际经济评论,2014(6):75-88.
- [14]马晓河.转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 [15]黄群慧.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J].经济学动态,2021(11):3-9.
- [16]戚伟,樊杰,李佳洺,等.“十五五”期间我国城市化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4):651-662.
- [17]郭春丽.经济社会发展迈入发达阶段时的特征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1(6):72-74.
- [18]黄娅娜,贺俊.“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比重合理区间探析[J].改革,2024(12):12-25.

The Pha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c Tren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eriod

YI Xin PENG Hui

Abstract: Shaped by profound shift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s, transformative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hina's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eriod(2026-2030) is projected to maintain an annual average of approximately 5.1%, and by 2030, per capita GDP is expected to reach \$17,000. China is poised to enter pivotal developmental phase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a critical sprint phase transitioning from medium-income to high-income development status; an arduous shift in growth drivers from traditional factor inputs and investment dominance to innovation-driven models emphasizing new-type production factor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enhancement, and consumption-led dynamics; a consolidation period advancing industrialization from conventional paradigms to post-industrial structures; an interim transition in urbanization from accelerated expansion to matur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nd a strategic adjustment reorienting green development priorities from pollution control to systemic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to and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e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in time and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support, so as to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e stable entry into the ranks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eriod and the per capita GDP will reach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35.

Key words: 15th Five-Year perio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c trend

(责任编辑:罗重谱)